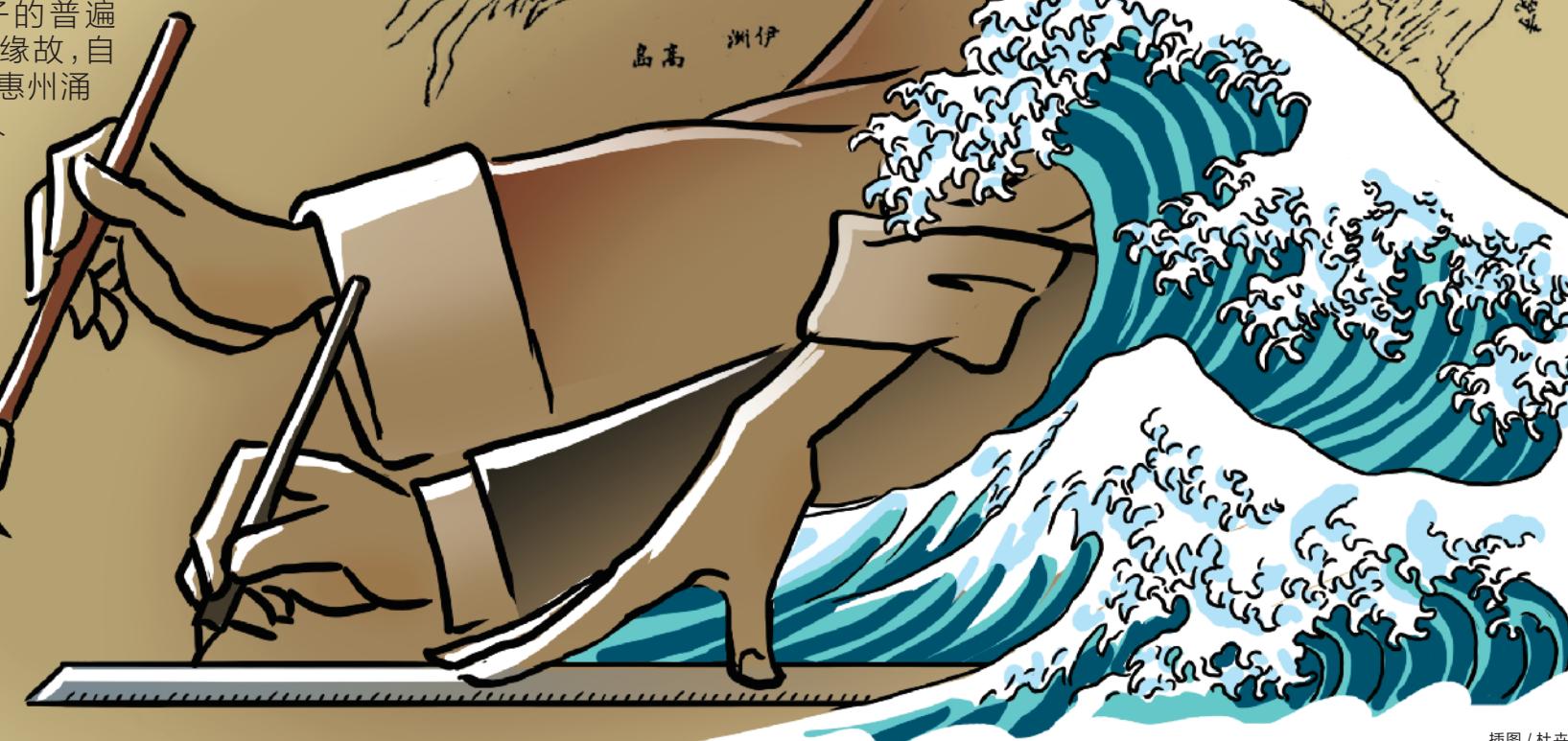


惠州文人墨客 靠丹青雄文 开启民智

作者 / 徐志达 吴定球 何志成

出外学成归乡，创办学校，用教育开启民智，提高民众素质，振兴民族精神，是晚清大变局中惠州知识分子的普遍追求。大概是这个缘故，自晚清至民国初年，惠州涌现的名人，教育界人士占很大比重。

以张友仁、李丹麟、李桂馨为首的晚清惠州文人，大都在科举制度下饱读诗书，具有很高的中国传统文文化素养。他们对国家和民族前途怀着强烈的使命感与责任心，满怀汲取西方文化、改造旧中国建设新中国的热情。



文脉寻访

文 / 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吴大海 实习生 郭妍欣

遊歷圖記

海
外
觀
風

遊歷圖記

入日平艮岐圖

国门打开，不少惠州士子获得出国游学的机会。光绪十七年（1891年），当欧策甲、邓仲果走进康有为万木草堂接受变法思想熏陶的时候，另一位惠州人李丹麟则远赴重洋，去亲身领略万里之外的欧风美雨。

李丹麟，字仁蔚，号星阁，归善县城（今惠城区桥东）人。他十岁丧父，靠奋发自学，年方十五即能为街坊作画写对，以诗画名于岭南。他的画法随意挥洒，花鸟人物，栩栩如生，大幅尤见苍劲。他有一幅《百鹤图》长卷，礼部尚书、南海人戴鸿慈见之赞曰：“飞腾隐伏，各有神致，神乎技矣。”

李丹麟也得到惠州知府杨霁的敬重。当杨霁的弟弟杨儒

奉朝廷之命出使美洲时，杨霁便举荐李丹麟，使李丹麟在读万卷书后，获得跟随国使出洋作万里游的好机会。

在此次出使中，李丹麟游历了美、日和秘鲁等国；后来又自费游览越南、柬埔寨及南洋诸岛，时历三年。“行踪所至，举凡山川人物，辄为图说以记之”，得《华盛顿图》《日本富士山图》《南美人背子卖物图》等共205幅，集成一书，名《游历图记》。

李丹麟的作品还参加过比利时国际画展，获双龙拱金奖。此奖牌挂于汝湖霞村李姓祖堂，1955年被洪水冲走。相传在美洲，他所画的鹰，人以千金争购；其嫁女，画鹰一幅作嫁妆，羡满四邻。这些故事至今在

惠州坊间流传。

清光绪三十四年（1908年），李丹麟任福建永定知县，其时已年过60岁，不久退休返乡。生平蓄有古琴十二，因以“十二琴”名其楼。楼侧建亭，自题为“清秀之亭”，平日读书作诗写画鼓琴于其间。

他热心振复乡邦文化，尝居百花洲，参与管理西湖。又与李绮青同组惠阳宏汉学会，编辑出版《循报月刊》，鼓吹学术，扇扬风雅，奖掖后进。张友仁、叶史材、黄植等青年才俊，均于此崭露头角而后成长为民国惠州文坛的中坚。

李丹麟还将画艺悉心传给侄子李长天，培养了又一位著名的惠州画家。

其才，不予追究。

李桂馨为增广闻见，曾寄居广州伍家园，尽览园中所藏名画。后来游历香江，转赴上海，应聘于一间书局，其间与高剑父、高奇峰等名家共创艺苑，致力于绘画艺术的创新和传播。

不久，他从人出使秘鲁，游历美洲。他和李丹麟一样，笃信“读书行路”古训，并不遗余力地实践。因此学养日深，“游踪已广，画益超绝，卓然为吾郡名家”。

番禺人黄佐曾以长诗题李桂馨山水画册，云：“壮游东极

三神山，探险西穷南北美。宇宙奇观眼底收，下笔纵横故乃尔。”民国元年（1912年），其画作《西湖八景图》在巴拿马赛会上获奖，画名大著，为惠州争得了荣誉。

民国三年（1914年）春，李桂馨归乡养病，应世交叶史材之邀，到广东省立三中（今惠阳高级中学前身）教画。受其影响，三中出了一批书画爱好者，其中以秦汉昭（寿宁）、李覃量（若峰）最有名。重视美育、热爱书画，成了民国时期省立三中的优良传统。

袁：曾和孙中山合作，又分道扬镳、互相论战。“如此前后矛盾，梁先生如何解释？”

梁启超没有回避，他沉吟了一会，认真地回答道：“这些话不仅别人批评我，我也批评自己。我自己常说，‘不惜以今日之我去反对昔日之我。’”

但梁启超也并非一味求变，更非为变而变。“我是有中心思想和一贯主张的。”他回答学生说，“我一生的政治活动，其出发点与归宿点，都是要贯彻我爱国救国的思想与主张，没有什么个人打算。”

对于这样的前后变化，这些知识分子自身也并非不知。梁启超晚年投身教育，成了清华国学院“四大导师”之一。有学生当面问他：您过去保皇立宪，而又拥护共和；曾是康有为信徒和助手，后来又分手；前头拥袁（袁世凯），后来反

史学家张友仁文教基建两开花

有的青年才俊奔赴大洋彼岸饱览异域风情，有的则留在故土，一边教书育人，一边接受来自西方的先进思想、谋求革命。曾加入中国同盟会，先后参加惠州淡水起义、北伐、抗日战争等的张友仁便是如此。他历经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、新民主主义革命、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三个历史时期，走过了一个历经艰险而百折不挠的人生之路，既是一位知名学者、开明士绅，又是一位民主主义战士、真诚的爱国者。

张友仁，惠州城区人，清末秀才。废科举后立志献身文化教育事业，投考两广简易师范馆，毕业先后任中小学教员、校长等职。他学识渊博，尤精文史，是继江逢辰、李绮青之后惠州文坛的领军人物。尤其重视乡邦文化建设，倡导成立了惠州私立丰湖图书馆；先后编著了《丰湖文献录》《惠州西湖志》《博罗县志》和《惠阳县志》等，为惠州保存和整理了大量

的历史文献和历史文物。

张友仁好奖掖后进，在他的带领和影响下，一批新秀在惠州文坛崭露头角，秦萼生、张凤子、任少游、曾固民以及稍后的吴仕端、古伯伟等，成为后来惠州文化教育界的精英。

崇尚文化教育的同时，张友仁也重视经济实业开发，尤其对发展公路交通和西湖旅游情有独钟，倾注了极大的精力和心血。广东的很多公路，都是他任广东省公路处长时规划的。广东首条公路——惠平公路（惠州至平山）就是由他主持兴建的。他还先后筹划和参与了惠樟公路（惠州至樟木头）、福泉公路（福州至泉州）和广汕公路（广州至潮汕）的建设。

新中国成立后，张友仁历任东江人民图书馆馆长、广东省文史馆副馆长、广东省第二届人大代表、致公党中央委员、第三第四届全国政协委员。

涌向来自西方的新知识、新文化、新思想，并借之寻求救国之道。

梁启超就是这群知识分子中的一员。他们面对种种学说，如饥似渴地吸收，畅快淋漓地表达。而对各种学说，他们也有接触和认知过程，并随着局势变化，他们的主张也在变化。因此那一批知识分子的主张，吐故纳新的特征十分明显。

但“变”与“不变”始终同在。正如梁启超所说，他变的是思想认知、爱国、救国的理想与追求始终没变。也正是因为内心追求没变，其外化的思想和主张才要因应时代变化而不断改变。

近代仁人志士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境界，对后人来说，是留存至今、永不过时的精神财富。

张友仁故居“梅花馆”或将改造开放

既是清末文人故居，又是“东团”（抗战时期东江华侨回乡服务团）活动旧址，坐落在惠州城区金带街上的梅花馆，见证了晚清士人张友仁投身地方建设、济世救国的身影。

近日，记者走访发现，沉寂多时的梅花馆或将改造文旅新景点。专家建议，可配合金带街文化氛围，在梅花馆内建“双主题”艺术工作室，让曾是惠州一景的梅花馆重新焕发生机。

实地走访：故居“梅花馆”前已无梅花

金带街五巷很狭窄，撑伞难以通过。拐进右手边小巷，一栋两层高的小楼就映入眼帘，这便是张友仁的故居梅花馆。小楼前立有金字石碑，屋内天井宽阔，一排红砖楼梯梯级上满青苔、杂草，直通向二楼。二楼木门斑驳，踏上走廊条形木板时，脚下咚咚作响。

“前几年我老伴走了，平时就只有我一人住，女儿偶尔过来。”70多岁的住户杨婆婆介绍，张友仁的弟弟是她姑丈，自己嫁到张家后就一直住在这。“文革”时期，梅花馆里部分房屋产权上交房管局，成为公房，目前可居住部分为私人所有。梅花馆现任屋主是张友仁侄子，多年前搬到甘肃定居，与杨婆婆接触较少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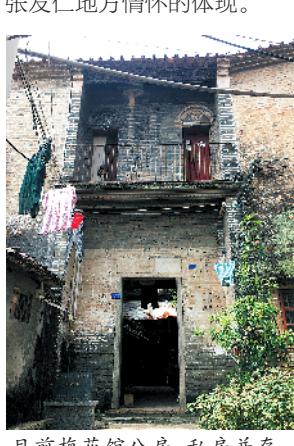
“听老人说，以前的梅花馆门前种了两株大梅树，还有两个金鱼池。”但她嫁过来时梅花树已不见踪迹，剩下两个

历史回眸：抗战时曾是“东团”办公地

金带街名人故居不少，街坊邻居都知道梅花馆是张友仁故居。但很少人知道，这里也是“东团”活动旧址。有文史专家表示：“把自己家借给别人办公、住宿这种‘麻烦事’，也只有张友仁做得出。”

“抗日战争时期，日军的战机都飞过来了，张友仁还惦记着随身携带的《惠州西湖志》书稿。偶有遗失，便想尽一切办法补齐。这种乡土情怀实在少见。”惠州学院政法学院历史系主任、副教授包国滔介绍，张友仁先后编著了《惠州西湖志》《丰湖文献录》《博罗县志》等地方文献。直到新中国成立后，他历经17年时间编撰的《惠州西湖志》才终于得以完整地呈现在世人面前。有识之士盛赞：“惠州西湖无完书，有之自友仁先生始。”

据《惠州西湖新志》统计，晚清至民国，西湖共有建设项目55宗，张友仁直接参与建设资助的项目就有7项。20世纪30年代，张友仁等地方名士在中山公园筹建“惠州私立丰湖图书馆”，将丰湖书院部分书籍迁入新址，拯救了无数珍贵文献。新中国成立后，张友仁成为丰湖图书馆首任馆长。在任职期间，他每月都抽出部分工资，为图书馆购置书籍、桌椅。



目前梅花馆公房、私房并存

专家建议：建成“双主题”艺术工作室

“改造名人故居成景点，需要的时间不短。”包国滔表示，改造过程中，政府要协调关系、处理资金问题，化解梅花馆屋主、住户的担忧。张友仁后辈要主动地向有关部门反映梅花馆的产权、损坏情况，和有关部门达成一致，更快地推进梅花馆的“活化”进程。

面对梅花馆内私房、公房并存的情况，包国滔提供了三个解决方案：一是只改造二楼公房，在户外修建一座观感上切合梅花馆气质的楼梯，让游客在不打扰一楼住户的情况下，直接游览二楼景观；二是以长期租借的方式协调屋主、安置住户，改造整个梅花馆；三是在梅花馆改造后，请回原住户，每月发补贴予以补偿。

“‘东团’烈士后人活动，以访谈的形式，重现老一辈人的‘东团’记忆，把寻找先烈后人、后人寻祖的故事讲给游客听。”让梅花馆做乡土情怀和革命情怀的展示馆，丰富梅花馆的旅游资源。”此外，包国滔还表示，金带街聚集着不少文人故居和古玩店，未来梅花馆可以因地制宜，靠展示张友仁及族人、“东团”成员及后人创作、收藏的文献、书法、画作，来“实现金带街文化氛围的立体化”。

同时，梅花馆还可以参照佛山南风古灶旅游区的活化模式，吸引艺术工作室入驻。工作室既能产出主题强的艺术产品，吸引游客消费；又能让游客在游览观光之余，自己上手练书法、描摹画作，增加参与感，实现艺术的再创造。



二楼木门斑驳

梁启超的“变”与“不变”：近代知识分子的心灵探索

羊城晚报全媒体记者 夏杨

谈及梁启超，人们首先会提到他酣畅淋漓的文章，“一支笔强于十万雄兵”，对开启近代民智起了重要作用。同时也会感触于他一生思想的多变、善变。

梁启超从旧学起步，师从康有为成其维新运动的得力助手，渐失失败后流亡海外；接触革命党后，其主张在立宪与共和之间摇摆，最终与维新越走越远；他一生宣扬西方文明，晚年却力主光大传统文化……

回想晚清民国那个时代，不独梁启超，很多知识分子的思想和主张都在不断变化。比如徐特立，幼年在私塾读八股文，后受维新运动影响，成了康梁信徒；戊戌变法失败后，他倾向于孙中山的革命之路；但此前的军阀混战，又令他内心苦

闷；最终选定马克思列宁主义，成了红色革命的教育家。

再如在历史上曾留下污点、支持袁世凯复辟帝制的杨度，其思想变化也很波折。杨度是举人出身，开始赞成君主立宪，反对共和革命。袁世凯当政后他倡议“筹安会”，失败后面对万众唾骂痛心悔悟，反对张勋复辟，转向帮助孙中山再创民国。后来他认识到工农革命将是中国未来，在白色恐怖中依然申请加入了中国共产党。

对于这样的前后变化，这些知识分子自身也并非不知。梁启超晚年投身教育，成了清华国学院“四大导师”之一。有学生当面问他：您过去保皇立宪，而又拥护共和；曾是康有为信徒和助手，后来又分手；前头拥袁（袁世凯），后来反

那时的知识分子如此多变，也和那个时代的特点有关。

正如李鸿章所言，当时面临的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”。政治、经济、社会、文化、思想等各领域都经历着大动荡、大变化。而被裹挟其中的知识分子，也随着自己对世界的认知在不断自我调适，表现出来的主张也是不断变化的。

在大变局中，心怀天下的传统知识分子之所以积极投身其中，也和时代有关。在大变局到来之前，中国思想界已经陷入困境。晚清时代，宋明理学走到末路，死板僵化的八股文，骇人听闻的文字狱，知识分子被逼进了训诂考据的狭窄角落。这时，西方的坚船利炮打开了中国封闭的大门，一批正陷于迷茫中的知识分子，立即放弃了陈腐学术，

涌向来自西方的新知识、新文化、新思想，并借之寻求救国之道。

梁启超就是这群知识分子中的一员。他们面对种种学说，如饥似渴地吸收，畅快淋漓地表达。而对各种学说，他们也有接触和认知过程，并随着局势变化，他们的主张也在变化。因此那一批知识分子的主张，吐故纳新的特征十分明显。

但“变”与“不变”始终同在。正如梁启超所说，他变的是思想认知、爱国、救国的理想与追求始终没变。也正是因为内心追求没变，其外化的思想和主张才要因应时代变化而不断改变。

近代仁人志士这种与时俱进的思想境界，对后人来说，是留存至今、永不过时的精神财富。